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4

1983

总第 28 辑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Maile zhuyi Yanjiu ziliao

1983年第4辑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列 宁 斯大林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216,000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书号 17001·115 定价 0.80 元

(只限国内发行)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1983年第4辑目录

- 新发现的马克思的两封信 孙魁译 (1)
 卡尔·马克思致雅科布·魏尔
 (1850年2月19日于伦敦) (2)
 卡尔·马克思致《纽约国家报》编辑部
 (1850年6月7日于伦敦)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中价值形式的若干问题(折译)
..... [苏]罗尔夫·赫克尔 马今译 (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美国版《编辑说明》简介
..... 刘焱 (23)
关于巴黎笔记 卢晓萍、章丽莉译 (40)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1847年6月)
——兼论大会代表和秘书威廉·沃尔弗的功绩
..... [民主德国]瓦尔特·施米特 赵振权译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的编辑出版
情况(摘译) [苏]亚·马雷什 艾思嘉译 (70)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准备材料》
序言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 刘功勋译 (79)
 研究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参考资料
无神论(续完) [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王澍 向晴译 (92)

狄慈根的政治思想

..... [法]皮埃尔·芬格尔 张念东译 (114)

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起源(摘译)

..... [德]卡尔·特施坦 罗铁鸽译 (129)

文献和资料

普列汉诺夫致恩格斯的十封信 高敬增 高放译 (145)

索菲娅·哈茨费尔特致卡尔·马克思

(1864年10月1日于柏林) 赖升林译 (163)

索菲娅·哈茨费尔特致卡尔·马克思

(1864年11月21日于柏林) 赖升林译 (164)

人物传记和回忆

卡尔·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

..... [英]艾伦·罗斯伯利 兰乾威译 (170)

国外学术争论

《帝国主义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地位

——日本经济学界六十年代以来的争论 李成鼎编译 (190)

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作为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摘译)

..... [西德]米·布克米勒 陈国雄译 (201)

科尔施的“走向马克思的道路”

..... [美]保·布赖纳斯 霍为译 (217)

卡尔·科尔施的理论贡献

..... [南斯拉夫]普·弗兰尼茨基 劳徒译 (233)

卡尔·科尔施(摘译)

..... [英]E·J·霍布斯鲍姆 马学泉译 (243)

卡尔·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列宁主义

解释 [苏]C·M·布莱约维奇 莫立知译 (248)

读者·译者·编者

对马克思捐款购买武器一事的不同看法 白玉琴 (262)

新发现的马克思的两封信

下面发表的卡尔·马克思在1850年写的两封信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新版)的编辑过程中新发现的。

在欧洲大陆的1848—1849年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不得不流亡到伦敦。马克思在伦敦继续从事革命活动，领导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重建它的中央委员会，同恩格斯一起出版同盟的理论刊物——《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他们在这个刊物上总结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深刻地分析了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后的形势。

这两封信反映了马克思的多方面的活动的某些方面。

1850年2月19日马克思致旅居美国的民主主义者、《纽约国家报》的所有者和出版者雅科布·魏尔的信(第1封信)说明了马克思作为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协会领导人在积极从事活动。这封信申明了委员会活动的原则，反映了马克思为募集流亡者的救济金，加强与在美国的德国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的联系而进行的日常工作。

1850年6月7日马克思致《纽约国家报》编辑部的信(第2封信)涉及到欧洲1848—1849年革命初期的事情。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在巴黎反对德意志民主协会的小资产阶级领导人(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等人)提出的由在法国的德国侨民组成武装军团打回德国在那里建立共和国的计划。这种“输出革命”的冒险举动遭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反对，同盟号召德国旅居法国的工人不参加这个军团，单个地返回祖国，根据情况在那里开展革命活动。事实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方针是正确的。1848年4月27日，

这个军团首战失利，全军覆灭，而数百名德国工人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帮助下回国参加了革命运动。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太因在美国报刊上发表文章为军团的发起者辩护，歪曲马克思 1848 年 3、4 月间采取的立场，马克思为此写了这封信。这封信提供了马克思反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的冒险行为的一些新材料，披露了马克思同他们的关系和流亡者中间存在的严重分歧。

这两封信原载于 1850 年《纽约国家报》。1983 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一期发表了这两封信的俄译文。我们是根据俄译文转译的。

第一封信

卡尔·马克思致雅科布·魏尔

纽 约

1850年2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以非常感激的心情通知您，为这里的流亡者委员会¹寄来的 30 镑 18 先令 5 便士的捐款已收到。

本委员会取名“社会民主主义”是为了标明人们主要求援²的那个政党。但是它一贯奉行的原则是：无一例外地救济每一个流亡者，只要他能够证明他确实参加过革命而又需要救济³。

出纳员亨利希·鲍威尔⁴

致以亲切的问候
您的马克思

载于 1850 年 4 月 20 日
《纽约国家报》第 16 号

第二封信

卡尔·马克思致
《纽约国家报》编辑部

虽然我只是从贵报得知伯恩施太因⁵和贝尔奈斯⁶二位先生对我的攻击⁷,但是您们未必将要求我同这样两个十足的无赖进行论战。我只打算澄清若干事实。

载勒尔的小册子⁸是在我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写的,而且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献给我的。而我本人在这同时在《新莱茵报》2月号和3月号上也叙述了6月13日事件⁹。

另外,伯恩施太因先生声称:

“当两个已经成为马克思先生的攻击对象的人在他的寓所里坚决要求他澄清问题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胆怯地否认自己的罪过,以回避问题等等。”

实际上,情况是这样的:

一天早上,伯恩施太德¹⁰、卡·伯恩施太因¹¹、洛温费尔斯¹²三位先生以及两个工人¹³来到我在巴黎的寓所¹⁴。他们事先有目的地从看门人那里打听到我不在家,然后突然闯进我的寓所并向我的妻子胡闹。我回家后得知这些先生的无礼行径,当即在恩·德朗克¹⁵和弗·恩格斯的陪同下找到这些先生的“大本营”伯恩施太德家(他当时正同席梅尔普芬尼希¹⁶和另外几个人在一起),让他作出回答。伯恩施太德对我说,他和海尔维格¹⁷作为领导人不能接受决斗的要求,但是他们打算让他们一伙当中的几个帮工出来应战。这种荒唐的建议自然被驳回。于是,伯恩施太德便对我家的行为一再表示歉意,并说这是误会等等¹⁸。

伯恩施太因先生说我“胆怯地否认”自己的罪过,其实,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明白,我不是背着这些先生,而是公开地当着他们自己

及其军团成员的面反对他们的行为。这些军团成员成群地拥进圣丹尼街我们的俱乐部¹⁹，是想恐吓我们，当然他们没有得逞。不过，为了表扬曾经是整个志愿军征讨的²⁰灵魂的伯恩施太德，我应该说，他从拉施塔特监狱往科伦给我写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示完全同意我在巴黎的行动并不再同那些只想为了自身的利益利用德国工人的热情的人保持任何联系²¹。

至于伯恩施太因先生，1844年有人在我面前，在卢格²²、海涅²³、海尔维格的面前，总之，在《德法年鉴》的撰稿者面前把他揭露为无赖和政治上可疑的人。揭发者是谁呢？是贝尔奈斯先生。然而，贝尔奈斯先生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他还写了许多封粗暴的信斥责伯恩施太因，在信中利用一切可能来表示对这个伯恩施太因的蔑视。那末，后来伯恩施太因和贝尔奈斯二位先生之间的关系又怎么非常亲热起来了呢？贝尔奈斯先生在许多充满“激动人心”的事实和热情的信当中的一封信²⁴中把谜底告诉了我。他的这些书信多年来使我感到幸运。我不愿意把这件丑事变为社会舆论的财富。就是这位贝尔奈斯二月革命前夕在其他一些同样保存下来的信当中的一封信中向我揭露说“尊贵的海尔维格”不是一般个人，而是政治家。可见，人们一开始就知道伯恩施太因是个无赖。至于贝尔奈斯，那末我应当承认，尽管我知道这个人有一些弱点，总是爱流泪，满足于自己心地善良，但是当我得知这个表面上装得狂热忠实于共产主义的人在二月革命之后逐渐投靠拉马丁和卡芬雅克²⁵时，我还是颇为吃惊。不幸的人！

1850年6月7日于伦敦

卡尔·马克思

载于1850年7月6日
《纽约国家报》第27号

(孙魁译)

注　　释

- 1 指 1849 年 11 月 18 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会议上成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它的成员有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奥·维利希、卡·普芬德和亨·鲍威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597—599 页)。从 1850 年 4 月 23 日的委员会报告来看, 马克思的信中所说的这笔钱是由纽约社会改革同盟捐助的(同上书, 第 607 页)。
- 2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1850 年 3 月初的报告中指出: “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流亡者来到这里, 他们大部分人不仅需要给予微薄的普通补助金, 而且迫切需要给予补助来购置衣服。在这样的情况下, 由于其他人和其他组织也曾想募款援助这里的流亡者, 大概是没有成功, 结果所有来到这里的流亡者大都向我们申请帮助, 于是本委员会的负担就更重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603 页)。
- 3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会议上通过的有关成立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决议指出: “委员会主要是救济社会民主党党员。但是, 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 委员会也不拒绝救济其他党派的流亡者”(同上书, 第 599 页)。
- 4 安得列阿斯·亨利希·鲍威尔(约生于 1813 年)——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51 年旅居澳大利亚, 后来去向不明。
- 5 亨利希·伯恩施太因(1805—1892)——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2 年起旅居巴黎。1844 年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报纸《前进报》的创办人和编辑之一。1849 年旅居美国。
- 6 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1815—1879)——德国政论家, 《前进报》的撰稿人。参与建立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1848—1849 年革命后旅居美国。
- 7 1850 年马克思同民主派报纸《纽约国家报》有密切联系。这家报纸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十二份材料, 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的片断,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四篇文章的片断、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三篇报告。马克思在这封信中予以答复的伯恩施太因的《辟谣》1850 年 5 月 11 日在《纽约国家报》上转载, 并附有编辑部的批评性的按语。

- 8 塞巴斯提安·载勒尔——德国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旅居伦敦和美国。载勒尔1850年在汉堡出版一本小册子《1849年6月13日密谋或资产阶级在法国的最后胜利》。这本小册子谈到马克思反对德意志民主协会的领袖的冒险勾当，揭露了伯恩施太德及其拥护者的行为。小册子的内封面上印有题词：“塞巴斯提安·载勒尔献给他的友人，《新莱茵报》主编卡尔·马克思”。在伦敦的流亡者，于1850年2月”。
- 9 指1850年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的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第二篇和第三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9—110页）。
- 10 阿达尔贝特·伯恩施太德（1808—1851）——前普鲁士军官，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7年至1848年初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出版者。
- 11 阿尔诺德·伯恩哈特·卡尔·伯恩施太因（1808—1849）——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领导人之一。
- 12 莫里斯·威廉·冯·洛温费尔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的领导人之一。
- 13 指福尔克和迈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04页和注379）。
- 14 这件事发生在1848年4月1日。他们的目的是要打听到1848年3月29日在《特利尔日报》上发表的尖锐批评伯恩施太因和海尔维格的冒险行为的一文的作者姓名。这篇文章是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关的倡议写的。德意志民主协会的人曾经给马克思留下一张纸条，坚决要求说出文章的作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3卷第2部分第420页）。
- 15 恩斯特·德朗克（1822—1891）——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 16 亚历山大·席梅尔普芬尼希（1824—1865）——前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失败之后，旅居美国。
- 17 格奥尔格·海尔维格（1817—1875）——著名的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
- 18 马克思可能当场把给德意志民主协会的人的纸条的书面答复交给伯恩施太因（见注14），回绝了他们的坚决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04页）。

- 19 指 1848 年 3 月 8—9 日在巴黎成立的德国工人俱乐部。俱乐部的成员反对工人参加德意志民主协会的冒险行动(见同上书, 第 21 卷第 254 页)。
- 20 1848 年 3 月中旬开始组建军团, 有八九百德国流亡者参加。法国政府希望外籍工人离开巴黎, 给他们提供了武装。1848 年 3 月底, 军团的先遣营开赴德国边境, 刚一越过边境, 便在多森巴赫战役中被消灭。
- 21 在多森巴赫战役中, 伯恩施太德被俘, 然后被交付法庭。上述伯恩施太德的信没有找到。他 1849 年 4 月 4 日致《新莱茵报》编辑部的信保存下来了。这封信是他在布鲁赫萨尔监狱中写的, 描述了囚犯们的恶劣的生活条件。
- 22 阿尔诺德·卢格(1802—1880)——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1844 年在巴黎与马克思共同出版《德法年鉴》。
- 23 亨利希·海涅(1797—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
- 24 见 1846 年 7 月 19—20 日卡·路·贝尔奈斯致卡·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 3 卷第 2 部分第 259—261 页)。
- 25 1848 年, 法国外交部长阿·拉马丁任命卡·路·贝尔奈斯为法国驻维也纳的专员。贝尔奈斯履行了这个使命, 后来, 当残酷镇压 1848 年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卡芬雅克将军在巴黎上台时, 他还继续担任这个职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中 价值形式的若干问题^①(摘译)

〔苏〕罗尔夫·赫克尔

I.

在本文中我们要考察一下马克思分析价值形式的若干问题。首先，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版中存在着关于价值形式的两次论述(第一章正文中有关论述，另外卷末又有一个《附录》)。要科学地解释这个问题，不能只是限于说明历史事实，而且还要涉及《资本论》方法论问题的积极研究成果的讨论。

大家知道，马克思特别注意价值形式的分析，并且把《资本论》中关于价值形式的阐述看作巨大的科学成果。他写道：“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象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②

关于正式着手分析价值形式问题，马克思在 1867 年 6 月 22 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在第一次的论述(由敦克尔出版的)中，

① 《资本论》第一版中的附录《价值形式》，已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9 卷。——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98 页注 32。

只是当价值表现已经以发展的形式即作为货币表现出现时，我才对价值表现作应有的分析，从而避免了阐述中的困难”。^①因此，马克思认为，他直到《资本论》第一版以前，并没有分析价值形式。当然，无论是在《大纲》中还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都涉及到了价值形式问题，不过马克思没有使用价值形式这个概念本身。在《大纲》中，我们可以找到下面这样的接近于分析价值形式的事实：“作为价值，每一种商品都可以等分；在它的自然存在中，它却不是这样。作为价值，商品无论经历多少形态变化和存在形式，都仍旧不变”。^②这里，马克思在1857年就已表明，必须把一种商品的价值形式和自然形式分开，价值能够经历各种不同的存在形式而不发生改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中，马克思把价值形式问题概括为：“这一个别商品的交换价值，只有在一切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成为它的等价物的无限多个等式中，才充分表现出来。它只有在这些等式的总和中，或者说，只有在一种商品同每种别的商品交换的各种不同比例的总体中，才充分表现为一般等价物。”^③可见，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研究了完成形态中的货币形式。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当马克思批判贝利的经济观点时，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又向前推进了。

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价值形式的第一次详细的分析。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恰恰这一部分是新的，而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已经把论述改进了，并且尽可能地做到了通俗易懂。^④因此，马克思事先指出，这一部分是不易理解的，当然，他是针对“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⑤说的。同时，关于价值形式的这一部分，也是在第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2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85页。

③ 同上书，第13卷第2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页。

⑤ 同上书，第8页。

卷付印前恩格斯、库格曼和马克思之间交换意见所谈论的问题。恩格斯和库格曼都曾向马克思指出，这一部分论述不好理解，要求他加以改进，要多分一些小节和多加一些小标题，“可以把这里用辩证法获得的东西，从历史上稍微详细地加以证实”，以便“用历史方法向庸人证明货币形式的必然性并表明货币形成的过程”。^① 马克思回答恩格斯说：“至于说到价值形式的阐述，那末我是既接受了你的建议，又没有接受你的建议，因为我想在这方面也采取辩证的态度。这就是说：第一，我写了一篇附录，把这个问题尽可能简单地和尽可能教科书式地加以叙述，第二，根据你的建议，把每一个阐述上的段落都变成章节等等，加上特有的小标题。我要在序言中告诉那些‘不懂辩证法的’读者，要他们跳过 X—Y 页去读附录”。^②

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情况：在第一版中既在第一章的正文中又在特殊的《附录》中两次论述了价值形式。这种双重的论述，也是库格曼建议的结果。库格曼曾劝告马克思说：“大多数读者需要有一个关于价值形式的更带讲义性的补充说明”。^③

当然，这样的叙述形式要求马克思在 1872 年出第二版时重新加以改写。这时，马克思首先从附录中的叙述出发。他为了论述这一部分，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这可以由遗留下来的一些手稿得到证明。这些手稿表明，马克思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对第二版中的论述进行了加工。

最终的论述，就是今天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所看到的那些内容。然而第一版中原来的两种论述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意义，研究第一版的这些论述，既可以加深我们对价值形式的正确理解，也可以加深我们对马克思的方法的理解。

①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 213 页。

② 同上书，第 21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4 页。

II.

一些时期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著作中，都进行着关于某些方法论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同《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相联系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一篇的研究对象问题。占统治地位的意见是，马克思研究的是简单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过程。但是，最近时期以来，出现了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不同意上述的看法，并且认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的简单流通放在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之前。

第二个问题，是《资本论》中商品价值形式分析方面历史和逻辑的关系。叶尔玛柯娃提出了这个问题的很有意思的方面，她指出，当学生们从研读《资本论》转入学习教科书时，或者从学习教科书转入研读《资本论》时，会发现人们深入理解马克思的方法时存在着差别：“……在分析简单价值形式时，《资本论》中和高等学校的教科书中所举的例子是有区别的。值得指出的是，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甚至举了这样的例子：‘1 把斧子=20 公斤谷物’（《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N·A·查格洛夫主编）；（从上下文的联系可以看出，这里指的不是普通的斧子，而是石斧，然而人们根本弄不清楚的是，这种交换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的。因为当“公斤”成为重量单位的时候，石斧早就进博物馆了），‘……拥有石斧的人用石斧换一头羊’（《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鲁缅采夫主编）……在这里，恰好说明所谈论的是什么斧子”。^①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H·李希特主编）则是这样写的：“简单价值形式是在历史上出现的，当时生产力发展程度比较低，交换，首先是原始社会中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交

^① 叶尔玛柯娃：《马克思〈资本论〉分析商品价值形式时的逻辑和历史》，《哲学》杂志 1977 年莫斯科版第 2 期第 38 页。

换，还带有偶然性”。^①由于这个例子的关系，又产生了第三个问题，就是在通俗性的叙述中，能不能做出这样的历史的、和《资本论》中的叙述不同的解释。马克思对通俗地阐述他的理论究竟持什么态度？

在对提出的这些问题进行回答的时候，应当以列宁的著名论断为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往后的叙述为我们揭明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在这个社会的开始直到终结的过程中的发展（和生长，和运动）。”^②

《资本论》中的叙述从商品开始，通过交换过程作媒介，进到资本的生产过程。而且，商品是以它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为前提的。产品必须先变成商品，才能通过交换关系变成另一产品。由此也就必然得出“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于是出现了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同这些商品进行交换的人。普拉霍特娜亚由此认为，“当这些人在《资本论》中刚出现的时候，生产当事人的面貌还不确定。关于他们，只能说他们是商品所有者——抽象的买者和抽象的卖者。只有当他们表现为价值自行增殖的当事人时，他们的规定才表现出来”。^③

因此，马克思开始时阐述的单个商品，是“庞大的商品堆积”的元素，从而被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元素形式。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商品中体现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重要的是应该指出，马克思把交换价值作为商品中进一步研究的一个方面，而把使用价值

①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4年柏林版第71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③ 普拉霍特娜亚：《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和他们的经济利益》，《莫斯科大学学报》（经济学）1975年莫斯科版第6期第14页。